

广东革命史选论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陈立平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广东革命史选论

陈立平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东革命史选论 / 陈立平著: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98-0297-7

I. 广… II. ①陈…②中… III. 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
史—广东省 IV. K29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378 号

书 名: 广东革命史选论

作 者: 陈立平
编 者: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高秀清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市东仁纸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3 mm×210 mm 1/32

字 数: 271 千字

印 张: 11.2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297-7

定 价: 22.00 元

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全国各地的中共地方史研究机构纷纷恢复和建立。党史研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涌现出大批新秀。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立平同志相识多年，从他在广东肇庆党史部门时起到调往东莞党史部门工作，一直保持交往。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曾出现部分人士“下海”从商的“热潮”。但立平同志不为所动，始终坚守党史研究岗位，并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孜孜不倦，默默耕耘，为党史研究事业作出不懈努力。正因为他虚心勤奋，刻苦钻研，从严治学，敬业乐业，终于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获得了2007年至2008年度“全国党史部门先进工作者”的嘉奖。本书就是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

这本书主要是有关中共广东地方史方面的内容，贯穿了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虽然仅侧重于西江地区和东江地区的党史事件和人物，但可以看出作者的科研素养和功力。我作为第一个读者，通观全书，深感到作者颇新的立意：

一、发掘闪光点。中共党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地方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国内外政治时局的变幻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其革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曲折性、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并且发生过无数的历史事件，涌现出大批的历史人物。如何从这漫长而纷繁的历程中发现、挖掘有价值的闪光

点呢？这对一个党史工作者的素质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在这方面，陈立平同志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交了一份很好的答卷。如对早期广东农民运动的研究，由于他先后在西江地区的肇庆和东江地区的东莞工作，便结合地方党史研究的区域分工，抓住了西江农民运动这一闪光点，发表了《彭湃与广宁农民运动》、《论西江农民运动的特点及其影响》、《叶挺独立团与西江农民运动》等一系列文章，对西江农民运动作了有益的探索。又如他在东莞工作期间，抓住了东莞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主要活动范围和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区域这一闪光点，先后发表了《华南敌后抗战的模范——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历史功绩》、《论东莞敌后抗战的历史地位》、《东江抗日根据地研究》等一系列文章。类似这些研究，既是当地党史研究的重点，又对广东乃至全国党史研究具有意义。这就反映出作者对地方党史研究的宏观把握和驾驭能力。

二、突出个性化。所谓突出个性化，就是突出地方特色。从革命史的角度而言，对于一个地区的党史研究，既要全面系统地反映这个地区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更要抓住这个地区的重大事件、重点人物，把最具代表性、最具特色、最能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展示出来。这是地方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立平同志在西江、东江地区的党史研究中，正是既注重广东乃至全国革命史中的重要题材，又突出了地方特色；既着力挖掘有价值的革命史料，又体现其鲜明的地方个性。如对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称叶挺独立团）的研究。由于这个独立团成立于肇庆，并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在广东和全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作者便主编了《叶挺独立团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发表了《叶挺独立团与北伐战争》等系列文章，并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了《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一文，《中共党史

研究》创刊号、《人民日报》先后作了摘要转载。还有关于东江纵队的问题，他抓住了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部——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研究，不仅突出了地方特点，而且又对东江纵队史和广东革命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三、追求新鲜感。所谓新鲜感，就是具有求新意识、创新观念，使论著富有新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提起历史（包括党史），往往容易产生某种偏见或误解，总认为历史就是“死”材料或古书堆。其实，历史并非都是陈旧的东西，而还具有鲜活的内容。但是，这鲜活的内容，除了历史本身的真实外，还需要研究者苦下功夫。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经说过：“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它不是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在这里，李大钊精辟地阐述了历史本身的涵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研究党史很有启发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党史，不能只埋头于故纸堆，而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从浩繁的史料中进一步升华，提炼新观点，总结历史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给人们有所借鉴，有所启迪。

陈立平同志正是朝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尽管他从事研究的只是局部地区的党史，但在其论著中却坚持立意求新，力显新鲜感。如他在《彭湃与广宁农民运动》一文中，引述了彭湃于1924年12月写给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报告作为依据，提出了彭湃在广宁等地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奠定了彭湃武装斗争的思想基础”这一新观点。又如对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袁振英（东莞人）的研究，前人鲜有涉及。而作者对此作了新的拓究，对袁振英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建党活动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较客观的评价。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因此，其研究成果《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获得了广东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的嘉奖和上海有关方面的积极评价。

一个地方党史工作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一直甘于在“清水衙门”默默耕耘已属不易，而在基层繁杂的工作中，能撰写出高质量的论作相对更难。但本书作者却以忠诚于党史研究事业的壮志，撰写出这部优秀的地方党史著作，这不仅对于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有所裨益，而且对广东革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诚然，一部著作当应力求完美，但也难以避免有某些瑕疵，本书也如此。如对个别事件和人物有溢美之处等。然而，瑕不掩瑜，本书仍不失为有价值之作。

适值仲春时节，作者函电索序，匆匆走笔，虽仍感文不逮意，但作为同行，对本书的出版，当致祝贺！诚望作者再接再厉，不断有新著问世。

黄振位

2009年3月28日于广州天河

（作者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目 录

一

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	(1)
彭湃与广宁农民运动·····	(9)
周其鉴对全国农民运动的贡献·····	(26)
论西江农民运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32)
叶挺独立团与西江农民运动·····	(41)
叶挺独立团与北伐战争·····	(50)
叶挺独立团北伐出发入湘时间考·····	(61)
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	(63)

二

东莞的土地革命斗争·····	(66)
西江暴动初探·····	(73)
论叶挺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82)
历经坎坷 忠贞不渝	
——纪念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叶挺·····	(94)
钱兴与广州一二九运动·····	(103)
矢志共产宏图业 为花欣作落泥红	
——纪念叶剑英诞辰九十五周年·····	(110)

三

论东莞敌后抗战的历史地位·····	(120)
华南敌后抗战的模范	
——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历史功绩·····	(131)
东莞沦陷记·····	(139)
日军侵莞暴行录·····	(145)
抗战时期东莞的人口伤亡·····	(151)
日本对东莞的经济侵略·····	(158)
东莞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67)
东莞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	(172)
东莞受降纪实·····	(179)
光辉的篇章 不朽的丰碑	
——东莞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贡献·····	(190)
论粉碎日军万人“扫荡”的历史经验和意义·····	(201)
土洋会议与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208)
东江抗日根据地研究·····	(221)
澳门四界救灾会的抗日救国活动·····	(234)
抗战后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	(257)
明智的抉择 真诚的合作	
——纪念蔡廷锴诞辰100周年·····	(264)
方方对抗日战争的作用和贡献·····	(271)
一个为中国抗战外交作出贡献的东莞人·····	(277)
中国共产党与华南抗战·····	(282)

四

东宝地区恢复武装斗争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	(294)
东莞解放纪实·····	(301)
功绩垂青史 精神励后人	
——纪念东江纵队成立60周年暨粤赣湘边纵队	
成立55周年·····	(309)
华南游击纵队的建立、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318)
广州解放对实现进军西南作战方针的意义·····	(328)
方方对解放广东及华南的贡献·····	(334)
人民群众的支前与广东的解放·····	(342)

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广东省东莞籍先进分子袁振英，曾追随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此，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①。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事迹长期以来鲜为人知或被人忽视。本文试图对袁振英在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作些探讨。

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袁振英，别名震瀛，1894年7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现称为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村），其家族是明朝末年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后代。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保存的袁振英个人档案中，他亲笔填写：“‘民九’（1920）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②。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宣布成立，以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在此之前，国内一些城市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根据新的史料发现，上海共产党于1920年6月成立，最早的成员只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① 袁振英：《再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

② 袁振英：《干部登记表》（1958年9月15日）。“民九”，指民国九年，即1920年。

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袁振英是在1920年8月加入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总共有16人：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①。

袁振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后，参加了一系列建党工作：曾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被陈独秀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劝恽代英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与恽代英到武汉三镇的工厂、学校调查劳工和学生情况^②；参与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党的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1921年春又跟随陈独秀在广州参加了重建广州共产党的活动，并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袁振英为何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呢？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信仰共产主义。袁振英原本信仰无政府主义，但当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受到了该校老师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思想的影响，受到《新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引导，后来又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思想有了转变，开始信仰和提倡共产主义。他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在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妨碍。”^③

其次是历史机遇。袁振英曾在香港英皇书院和皇仁书院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载《“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袁振英的坦白书》（1958年12月25日）。

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他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中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华得到陈独秀赏识。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继续主办《新青年》，并联络一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开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年7月，袁振英结束“广东游东记者团”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说活动，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他“帮忙一切”^①。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是年冬，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想趁此机会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发展共产党组织。与中共发起组有密切关系的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也决定随陈独秀到广州去，与广东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但他们都不懂粤语，需要一个懂粤语的同志在身边传话。袁振英跟陈独秀有师生与同志的双重关系，又会讲粤语，这就成了最佳人选。1920年12月，袁振英随同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广州，充当他们的翻译，从而得以参与组建广州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在广州，由于陈独秀与袁振英的关系密切，故当时许多人说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②。

中共发起组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袁振英是中共发起组的成员之一，并参与了一些建党活动。因此，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献出了一份力量。

二、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袁振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之一，还是中国社

①② 袁振英：《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1955年8月3日）。

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社会革命，于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最初发起者为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俞秀松担任书记^①，袁振英、施存统、叶天底、金家凤主持团务^②。

中共发起组于1920年9月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第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教员有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袁振英担任英文教学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该校学生中开展建团工作，发展团员。该校学生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李启汉等30多人，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外国语学社既是团员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又成为掩护党、团活动的机关，而青年团是外国语学社学生的政治核心组织。1921年4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中挑选二三十名团员，分几批赴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些团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甚至骨干。

袁振英参与筹建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像党的发起组那样，在全国建团中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人员或发信函，积极联络、发动、指导全国一些大城市开展建团工作。至1921年春，各地已有团员1000多名，这些团员后来也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青年运动领导人任弼时曾经指出：“1920年成立的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

② 《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①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曾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②。如上所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为党的创建培养和输送了人才。其中理所当然亦有团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之一、外国语学社教师袁振英的一点功劳。

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当时，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肩负着传播马列主义的历史使命，袁振英就是其中一个。他加入党的上海发起组后，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列主义，“已由一个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共产主义者”^③了。

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1920年8月，创办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9月，将《新青年》月刊从第8卷第1号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列主义；11月，创办半公开的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袁振英为上述刊物撰稿，并担任《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工作。袁振英常用“震瀛”的笔名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译

① 《任弼时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4月12日）。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③ 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底根源》。

作，他曾说过：“我在腐败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政府的时候，又看见世界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小民族，我真想象胡风一般把我的头颅变为一个大炸弹，掷向这个地球去。所以我的笔名是震瀛（振英谐音），‘震动瀛寰’的意思。”^①从中可以看出当年这位热血青年向反动势力宣战的革命气概。袁振英担任上述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每月只拿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坚持用笔杆去宣传马列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6号后来改在广州出版，时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袁振英，仍然不计报酬，参与该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中共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改组了《新青年》编辑部，使《新青年》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把主张“不谈政治”的胡适等人分化出去，吸收了袁振英、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等中共发起组成员担任编辑工作。改组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中共发起组为什么要在《新青年》中开设这专栏呢？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现实，震撼了整个世界，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开设这一专栏，就是要帮助人们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成功经验，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而引导中国人民坚决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陈望道曾指出：“在《新青年》

^① 袁振英：《从学习胡风事件中来观察我自己的思想底来龙去脉》（1955年8月3日）。

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①中共发起组选择了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

袁振英不负党组织的重托，尽心竭力办好这个专栏。那时的中国，马列著作和介绍苏维埃俄国的文章很少被翻译过来，只能从外国报刊上看到一些。于是，袁振英千方百计找到在中国发行的外文报刊，如纽约的《Soviet Russia周报》、巴黎的《人道报》和《共产报》、英国的《自由》月刊、莫斯科的《真理报》等，还有列宁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把有关内容译成中文，然后发表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上，每期他的译稿都比其他作者多。笔者查阅过《新青年》第8卷1号至6号，并作了以下的统计，“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袁振英、李达、李汉俊、杨明斋、陈望道、张慰慈、周佛海7人的译文和文章共35篇，其中袁振英（以“震瀛”为笔名）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他的译作题目有《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列宁与俄国进步》以及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等。袁振英主编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政策、法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人民生活以及列宁的思想和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启发和引导了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促进了共产主义者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

总之，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因此可以说，这是袁振英参与早期建党活动的一个特殊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

^① 《陈望道谈话记录》，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8期。